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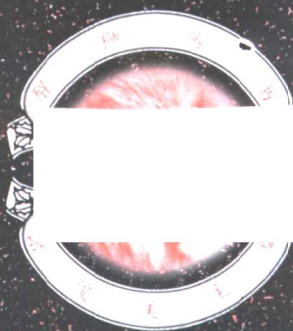


天演论

●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严复 译著
冯君豪 注解

中州古籍出版社



●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天演论

严复 译著 冯君豪 注解

中州古籍出版社

58.121
HXL

醒狮丛书

天 演 论

严 复译 冯君豪注译

责任编辑 张燕萍 责任校对 冯重焙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375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200 册

ISBN 7-5348-1625-4/C·4

定价:21.00 元

《醒狮丛书》总序

《醒狮丛书》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里我想说几句话。

1997年冬,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郭孟良先生和张燕萍女士风尘仆仆从郑州来到上海,邀我主编一套有关介绍近代思想家名著方面的丛书,想以此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近代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他们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想法非常好。其实,江泽民主席近几年来一直要求我们加强近代史的学习,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们的编辑计划得到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鉴于此,我虽不才,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其次,我想要说的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什么要不惜花大力出版这类盈利不多的著作呢?我想自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一番道理。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历史研究乃至出版计划,往往都是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再到历史中寻求答案。随着社

会历史的飞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不少人对于历史知之不多。由于多数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变局”,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理论上的探讨,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多次出现了历史上重复出现的现象:八九十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先是鼓吹新儒学,大倡文化复兴,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建设的动力。苏联解体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又鼓吹西方中心论,把西方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所谓方法论,乃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理论,也不顾这些理论原生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的文化目标,一股脑儿地介绍到中国。其中有些理论、主张由于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不合中国国情,很快退出了文化舞台而销声匿迹。不过,透过这些言论、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仍然没有超越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这一范畴。从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思想文化领域的中西文化之争实际上是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深化,是国人在国门打开后,有鉴于国际社会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深感自己落后,急于寻求迅速改变现状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争论的表层好象是现代化问题,实际内里还是一个如何看待西方的近代文化和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问题。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拍击中国的堤岸,进行殖民侵略,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从船炮器械到声光化电之类的科学技术,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到民主、人权乃至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等,并日渐同

中国传统的文化发生抵触乃至冲撞,由此而引发了中西文化之争。由于民族战争的一再挫败,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承认和看到了西方的长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学习西方这一著名的历史课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围绕着学习西方,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先后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西折衷调和、全盘西化等等主张。这些主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都是在近代中国国情制约下,特定思维模式的产物,它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因“世变之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

翻阅历史,我们发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常常为新的主张而陶醉,又常常为每一次新的迅即失却而变得痛苦不堪,并为企盼下一个更新的主张而激动不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采西学议”,王韬、郑观应公开鼓吹设议院,而容闳则干脆将他所了解和学到的西学知识投诸于他的斗争活动。然而随着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人们对“中体西用”产生怀疑。在国家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复站在救亡图存的反侵略立场,译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搬来了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向人们大声疾呼:若再不变法,中国难逃“优胜劣败”、弱者灭亡的厄运。由此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谭嗣同则提出冲决一切罗网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维新变法,孙中山等发动和领导了反清

的辛亥革命,企图“西体中用”,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拯救民族危亡。然而变法的失败和革命的天折,又一次使他们陷入痛苦和悲哀之中。在流亡异国的日子里,康有为撰述了《大同书》,企盼大同世界的出现,然而他乃至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始终也未找到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层面楔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较,从而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发表了《新民说》,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孙中山在屡经挫败后,重新构思新的建国方略。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则揭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出塑造现代人格的呐喊,主张实行观念形态的革命,进行文化重建。新文化运动中除旧布新的若干内容,时至今日还灼然有华。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每一场争论,时而给人以惊吓,时而又给人以力量。这种争论构成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绚丽多彩的画卷,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史上的中西文化之争早已有了结论。历史告诉人们,东西方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各有其成就和局限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近代史上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真理而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评判,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只是相对于现代化的目标而言,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落后于生活,接受和吸纳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不可规避的事实,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探索,直到五

四运动前夜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最高结晶——马克思主义。又经过三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最后实现了民族独立,成功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斗争活动以及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和见解、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我想这大概就是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意图吧。

最后,从编辑本丛书而联想到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问题。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忧危国家的前途命运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个人的历史可以有轻浅,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大业犹如大海巨川,波澜壮阔,汹涌向前。人文知识分子不应为目前的困难惆怅和忧伤,不应弃守自己的阵地,应当像历史上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的呻吟和独立富强的热望交织中,毅然决然投身社会,追踪时代,大胆探求真理。社会经济运作机制的大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种守恒力量,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重塑自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重建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让我们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共同努力吧。

谢俊美

1998年1月于沪上

序

谢俊美

1894 年的中日甲午一战,把鸦片战后的变局急转而为“世变之亟”。战后各国掀起的划分势力范围、旨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使救亡图存成为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变是以循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士大夫们相信五德转移,三统相承;老百姓则称之为 30 年河东,30 年河西。这种古老而又懵懂的循环论直到戊戌变法前夜,才被两本著作所打破。一本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再一本就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前者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借用今文经学家的公羊三世说,别开生面地说明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现实的变法造出了一种历史依据。后者则让中国第一次完完整整地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公理”,这种学理是十三经里所没有的,但它对于近代中国人

所面临的变局却提供了一种易为局中人接受的解释。这种从来未有过的变的观念,呼唤着从未有过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带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天演论》即进化论,原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中的序论和本论两篇。严复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许多案语,阐发了他自己的见解。1897年12月在天津《国闻报》上公开发表,1898年2月正式出版。严复在书中支持为赫胥黎所反对的斯宾塞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和自然界一样,都是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强者、智者自能生存,弱者、愚者则被淘汰。这种用生物的自然竞争来解释和取代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但在当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复站在救亡图存的反侵略斗争的立场上,向人们大声疾呼,若再不变法图强,中国难逃“优胜劣败”、弱者灭亡的厄运。是书一经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撼。康有为见了此书,盛赞严复为精通西学第一人。文人孙宝瑄在其所著的《忘山庐日记》中则写道:“昨读《天演论·导言四》,严又陵案语有云:岛国僻地,物竞较狭,暂为最宜。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岁月之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余为之掩卷动色曰:诚如斯言,大地之上,我黄种及黑色、红种其危哉。”(该书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受进化论观点的影响,中国一批又一批的传统士人在洗了脑子之后,逐步转化为或多或少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汉译西书在中国的历史虽然较早,但是有计划有组织成规模地进行则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其中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译书处和京师同文馆成绩为最。而译者则又以传教士居多。在那时的中国人中,能象严复那样熟练地阅读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士

大夫知识分子还不太多。严复对自己的译书曾提出信、达、雅的要求。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易》曰，修辞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五册，第1321页）这三个要求的提出与严复本人治学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严复早年就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学习古文辞，对先秦古文曾下过一番功夫，他用古文体译书，自在情理之中。当时译西方学术著作颇为不易，“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同上引）为了找到与原著文义相近的词汇，只好在中国古典经籍中苦苦寻觅。再，当时中国知识界通行文言文。用古雅的文体来翻译，借用古代典籍中的某些词语来作为新思想的载体，也许更能为众多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思，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同上引）他是为了宣传新思想，针对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才这样做的。对于严复的这种译法，当时人就持有不同的看法。吴汝纶阅后大加赞叹，说“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其书乃赳赳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而梁启超则认为该书语言过于艰涩，深奥难懂，“其文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也不利于年轻人的学习和新思想的传播，“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积习，吾不能为贤者讳”。（《新民丛报》1903年第1期）评价如此悬殊，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无论如何，信、达、雅这三个要求毕竟构成了严复本人译书写作的特色，同时也为百年来学术界所认可。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首创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以来，白话文早已取代了文言文。现代快速的生活节奏和高

科技传媒手段使大多数年轻人不读古文,或看不懂古文。除非为了某种研究需要,但那只是例外。所以,还在80年代中期,就有人在《书林》杂志上撰文,指出《天演论》以桐城派古文笔调译述西方的哲学思想,该书对于今天的青年读者来说是不易读懂的。冯君豪先生深知这项研究工作的意义,为了让青年朋友们理解其中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毅然决定对《天演论》进行注释和今译。

君豪先生与我同乡,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功力深厚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立品高尚的长者。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勤于著述。前年出版了38万多字的《中外文明交流史话》一书,今年又撰成了《严译〈天演论〉今解》这部新著。其令郎重煊同志委托宋竞兄嘱我代为作序,吾不敢辞。如果说百年前严复为了警世救国将英文《天演论》译成中文,曾开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智慧,那么百年后的今天,君豪先生为了繁荣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将严复用古文翻译的《天演论》译成白话文,必将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我展读全书,所得的印象是行文流畅,表达准确,注释完整,交代清楚。不仅吸收了前人和今人对这一名著的研究成果,而且更多地熔铸了先生对这一名著的精辟见解。我对先生多年来的辛劳表示敬佩,同时也为先生完成这部有价值的著作表示祝贺。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室

前 言

公元 1898、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奠定晚清一代启蒙大师严复地位的《天演论》文言木刻本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初版问世了。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其时知识界的高度重视。书中反复阐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给清末的中国人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它呼唤人们必须变法，必须维新，必须融西学为我用，必须按时移世易的对策办事，中国方能振兴，国人方能生存，我们的民族方能以强者的姿态自立于世界。

《天演论》问世已近百年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江山几易其主，国事今见其新。在改革开放的今朝，百年前出版的《天演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会不会仍有其不容低估的作用呢？人们能不能借鉴历史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呢？我们可不可在新时期将其转化成新的养料呢？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我们今日的国力跟晚清是无法相比的，但若量以西方国家的发达程度，则其间尚有一段颇大

的差距,这差距倘不迎头赶上,使之渐渐缩小,使彼此的力量渐渐相等,那我们便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须知落后的结果是会挨打、受凌辱的。中国人谁也不愿见到这种局面的重现。因此,基于这种考量,我们应怀抱“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做出卓越的成绩,以贡献于世,以无负于严复当年译述《天演论》的用心,以无愧于我们这一伟大民族所肩负的时代使命。

众所周知,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是趋向缓和,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里,战争的威胁是不存在了,而世局的变易却是难以逆料的。为了应付这种风云变幻的时势,以期立足于不败之地,发展经济当是首要任务。中国自与西方打交道、吸收西方文化为我所用以来,已有百余年历史。时间不能算短,然而我们的经济常常是迟缓其行,老是停留在某一阶段,难以上升到更新的高度,以与西方发达的国家相抗衡。欧洲自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百年来之“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方之五洲与夫前古各国,最多故耳!”(《论十七·进化》)这是赫胥黎当日西方的写照。如今的西方,其工农业文明的程度又远胜往昔,在世界上仍遥遥领先。我们过去因闭关锁国错过了几度效法西方力促经济兴旺的大好机会。现在改革开放了,再也不能坐失良机,要大力从事建设,让国家日益丰足,人民日益富裕,“丰者近昌,啬者邻灭”(《导言三·趋异》),严复的按语,我们要好好记取,好好体会。而今,我们的经济在大幅度上升,外汇储备已越过千亿美金的大关,这正如外国评论家所说的中国的前进态势已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可要达到“极盛之世,人量各足,无取挹注”(《导言十八·新反--严复按语》)则还有一程遥远的距离。瞻望西方,我们更深感自己的任重道远,更应奋起直追,更应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把我们的工农业提到一个崭新的水平而战斗不懈。

严译《天演论》除了讲述富国以强的道理之外,还讲述了发展

科学技术、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其《论三·教源》有云：“吾人日讨物理之所以然，以为人道之所当然，所孜孜于天人之际者，为事至重。”此处所谓“天人之际”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们将这方面的学问研深研透，就能进一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控制自然。也就是严复本人说的：“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译《天演论》自序）用逻辑方法把握数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便能通晓天地间的各种复杂现象，参悟其变化规律，进而大搞创新发明，使科学技术这第一生产力来推动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则工业与农业的现代化定能顺利实现，于国于民也是大有裨益的。“五四”时有人曾提出“科学救国”的口号，在当时的情况下殊无实行之可能。只有改革开放了，才可逐一地甚而全面地付诸实施了。如今，国内的一批志士仁人在高科技领域内所创建的第一流成绩已在世界上据有一席非凡之地，这是十分光荣而可喜的事。今后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还应尽力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力争攀登世界科技的高峰。与科技同等重要的乃是教育，严复对此同样十分注意。他就赫胥黎氏之原论，于按语中发挥道：“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导言十八·乌托邦》）在世界进入和平竞赛的当今，一个国家、一种民族要想突耸于全球先进者的行列，教育最具有关键性，教育决不能放松。国家之于教育应有长远打算，既要逐步消除文盲，又要稳步提高全民素质，更要造就大批的杰出人才，用以推进我们的事业，完成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必为致所宜以辅之，而后其业乃可以久大。”《天演论》中的这样的话，现时依然有其指导意义。科教并重，国家必兴，民族必强，凡具深识者，当有同感。

《天演论》还涉及人口及生态变异等内容，这，我已在《严译〈天

演论》管窥》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说,读者自可在本书中参看,这儿就不再重复了。《天演论》的著者和译者曾经发表过的许多见解,有些已过时了,有些还很新鲜,就仿佛是针对我们眼前提出来的一样,自有其重大价值在,关心世务者断不能忽略。犹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若干深识之士目睹西方发达国家的日新月异的诸多成就,对照自家的后进态势,不禁惊呼:我们的科教与经济必须迅速赶上世界中、高层次的水准,绝不能一误再误,倘不思上进,则将重演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历史悲剧,我们将面临被地球开除“球籍”的危险。所以在形势已获好转的此刻,我们仍应心怀戒惧,盖“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此不仅物然而已”(《导言三·趋异》),人类亦若是也。美、澳两洲的土人日渐式微,姑不论已,即我们素称文明昌盛的中华大国,百余年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不也是活生生的事实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天演论》一书便应具此等心境,唯能如是,始可振作,始可日进千里,始可追及先进,奋力而为上游之邦!

《天演论》此书是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是当日中英文化交流的合璧。书中所阐发的西方文化思想之精义,使当时人耳目为之一新;书中又包含着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精神。说是译,倒不如说是著。严复是以雄踞清代文坛二百数十年的桐城派古文笔法从事译述的,桐城派古文讲究义理、考据、词章,故其译书成果,篇篇是声韵铿锵的典雅式古文。书出不久,时人有以之作国文教本教授彼时诸生的。正因如此,故其文对今天年轻的读者而言,是颇不易读懂的。在《天演论》初版问世之明年、即1998年100周年迅将来临之际,个人不知学识之浅陋,竟对它做了今解。全书35篇,每篇由评析、正文、详注、今译四项组成,目的在帮助年轻的读

者较好地理解文义。惟个人学养不足,所作评、注、译,定存错误多
多,恳祈学者、专家及读者诸君及时纠正,是为万幸,是为万幸!

本书在编印过程中,承中州古籍出版社领导的多方关照,尤蒙
责任编辑张燕萍女士的悉心相佑,更难能可贵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日本神户学院大学客座教授、我国著名的杰出的近代
史专家谢俊美先生特于百忙中抽暇为本书写序,高情厚谊,至为感
人,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忱!

冯君豪

1997年1月13日